

辞书研究



CISHU YANJIU

2
1979

辞书研究

1979 年第二辑

出好辞书，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本刊评论员（1）

——祝贺《辞海》1979 年版诞生

《辞海》是怎样修订的？…………罗竹风（5）

解放思想是加速《辞海》出版的推动力……束纫秋 徐寿明（16）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郭加复（24）

综合性辞典浅谈…………舒 池（33）

辞书编纂中的平衡问题…………严庆龙（35）

从一枚金币看作者的辛勤劳动…………肖 岚（38）

编辞书和查资料…………陈光裕（40）

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朱 方（42）

要让客观事实讲话…………陈 炳（45）

这也是“水分”！…………王自强（48）

怎样介绍科学家…………秦振庭（49）

从“福”字说起…………卢润祥（50）

试论辞书的政治性…………巢 峰（53）

坚持辞书的科学性…………徐庆凯（65）

知识性——辞书的中心…………杨祖希（71）

谈辞书的稳定性…………冯英子（81）

辞典要有简明性…………池 哲（86）

选词十忌…………王芝芬（91）

综合性辞书的体例…………严 霜 王自强（94）



语文词典有阶级性吗……………谢自立(100)

对几种释义类型的分析……………鲍克怡(113)

——讨论语文词典有没有阶级性

词典与政治纷争……………〈英〉R.W. 伯奇菲尔德(120)

关于词典编纂工作的自动化……………〈苏〉E.B. 维尔捷利等(129)

词典字头的性质及其释注……………刘叔新(136)

破读音的处理问题……………唐作藩(148)

我们研究的结果……………〈荷〉阿尔—卡西姆(159)

——词典编写和评价的标准

关于《广州话方言词典》……………饶秉才 欧阳觉亚 周无忌(163)

《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的编写问题……………周长楫(172)

关于汉语成语词典的引源问题……………孙良明(188)

双语词典中的释义和翻译……………陈楚祥(193)

双语词典中的词语复现问题……………韦光华(202)

略谈《广雅疏证》的词义训释……………祝鸿熹(211)

中国辞书史话(下)……………方厚枢(219)

百科全书(下)(英国百科全书条目选译)……………周忠杰译(230)

关于编写《汉语白话文词典》的建议……………裘克安(257)

辞书人物

“好哇，大主笔！”……………黄建华(259)

——法国辞典家罗贝尔小传

简 讯 · 编后记

出好辞书， 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祝贺《辞海》（一九七九年版）诞生

本刊评论员

在全国亿万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热潮中，《辞海》（1979年版）问世了，这是解放后我国大型辞书编纂出版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对提高人们科学文化水平，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我国工具书和辞书的编纂出版有悠久的历史，是世界上出版辞书最早的国家之一。汉初学者缀辑西汉诸书增益而成的《尔雅》，东汉许慎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原的《说文解字》，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明代的《永乐大典》共有22,877卷，三亿七千余万字，曾被西方称为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内容也十分丰富。这些对保存、积累、发展祖国文化起了重大作用，反映了中华民族具有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历史。但是自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辞书编纂工作便日益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如此，解放前编纂出版的《辞源》、《辞海》、《辞通》等，供读者查阅参考还是起过一定作用的。

建国以来，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重要，同世界各国交往日益

频繁，而辞书的编纂出版却大大落后于客观形势，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辞海》修订廿多年，几经周折，特别是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难产”。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党的关怀和重视，《辞海》才获得新生，正式出版。这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一项基本建设，在出版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在辞书编纂出版工作中是一个重大突破，特别是随着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对于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神州九亿争飞跃”的宏伟事业，需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才有可能实现。现代科学技术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各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的理论学说，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出现。我们的工人、农民、战士和干部只有具备相当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化的生产技术，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的知识分子，既是科学文化的传播者，又是科学研究的尖兵，更需要进一步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担负起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光荣任务。正如华国锋同志所指出的：“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摆在全体人民面前的一项极为巨大的任务，这是一项战略任务，这个任务不解决，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要求在整个社会提倡勤奋地学习和钻研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毫无疑问，在这当中各种工具书包括辞书将日益迫切地为人们所需要。《辞海》（1979年版）的出版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

人类知识浩如烟海。不论是谁，都不能事事直接经验，必得借助前人和别人的经验和知识。无论是基础学习或科学研究，涉及到每一个人的专业以外的知识是很多的。《辞海》的特点之一，就是适应这样的要求，可以适当满足普及与提高的共同需要。《辞海》内容涉及120多个学科，选收单字14,872个，词目91,706条，包括成语、典故、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团体组织，以及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等。可以向一般读者提供某一问题的基本概念

和必要的知识。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你在学习、科研中遇到一个个“拦路虎”时，《辞海》可以发挥其“利器”的作用，帮助你排除困难，解惑释疑。它是案头的“良友”和朝夕皆可请教的“老师”。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业已公开出版，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辞源》以及各种专科辞典的编纂、修订工作，特别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都在积极进行中，并将于明年开始陆续出版。可以设想，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来到，必将迎来一个文化建设高潮；而在这个文化建设高潮中，我们将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辞书。这一喜人的形势，正鼓舞和策励我们加快步伐前进。

要做好辞书编纂工作，就要有一支雄厚的编纂队伍。《辞海》经验证明，要编写一部辞书，绝不能搞“人人编书”的群众运动，也不要搞那种形式主义的工农兵参加的“三结合”，必须实事求是地依靠专家、学者，依靠知识分子。直接参加过编写《辞海》工作的专家、学者超过5000人，他们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在长期编纂实践中掌握和熟悉了辞书编写的基本知识。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不可能编出新《辞海》来的。现在，许多专科辞典、大百科全书的一些分册，又都是以他们为主体进行编纂的。事实证明，他们是辞书编纂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巩固、充实和发展这支力量，加强辞书作者队伍的建设，是保证辞书编纂的一个基本关键。

要做好辞书编纂工作，还要有一支得力的编辑队伍。《辞海》经验证明，一部辞书从计划编纂到定稿出版，除了作者的辛勤劳动外，始终离不开编辑的精心浇灌。辞书的编辑，既是辞书的组织工作者和技术规格设计师，又是作者在编写辞书条目时的得力助手和“作战”参谋。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辞书的编纂，大多是集体创作。承上启下，左右联系，穿针引线，搭桥铺路，能够离开编辑吗？不能。统一认识，统一规格，加工整理，联成整体，能够离开编

辑吗？不能。事实证明，熟悉辞书业务，掌握辞书规律，热心辞书出版工作的编辑，也是辞书编纂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巩固、充实和发展这支力量，加强辞书编辑队伍的建设，是保证辞书编纂的又一个关键。

要做好辞书编纂工作，还要加强资料建设。编纂辞书，离不开资料。知识是个无边无际的世界，任何人都无法懂得一切，记住一切；编辞书不是靠灵机一动地拍脑袋产生的，而是靠成年累月地积累资料、掌握资料编出来的。离开了资料，编辞书就寸步难行，即使勉强编出来了，也只能是废品或次品，同知识丰富和资料翔实的要求距离很远。在辞书编纂过程中不断加强资料建设，包括资料的搜集、整理、积累、运用等等，不能不是保证辞书编纂的关键之一。

以上这三个关键，是实践所已证明了的最基本的关键。

当前，随着全国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各条战线都围绕着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人人想四化，人人钻四化，人人干四化。工具书和辞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也在急起直追，争取为四化服务。《辞海》是建国后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书，在廿二年的修订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十分丰富，这些对其他辞书的编纂出版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在《辞书研究》的第二辑中，已部分予以刊载，以供大家研究和探索。

我们祝贺《辞海》(1979年版)诞生，热烈希望有更多的辞书相继问世，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辞海》是怎样修订的？

漫谈《辞海》的性质和历程

罗 竹 风

辞书和其他工具书的出版工作，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欧美各国和日本在这一方面，显然是先进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多，而且文化悠久，但辞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却是相当落后的，与国家地位和人民需要，极不相称。

《辞海》的修订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质疑问难”的综合性辞书，这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向“四化”进军，都是很有帮助的。

修订《辞海》的任务，是1957年秋毛泽东同志交给上海的，转眼已经二十二年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既有无限感触，也有说不尽的喜悦和慰藉。总之，经验教训是不少的。

一、走过一段弯曲的道路

由于缺乏经验，对任何一件新工作，在没有掌握它的规律以前，走点弯路总是难以避免的。修订《辞海》也是这样，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我们走了一段弯路，付出了一定的学费。

概括说来，《辞海》修订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8年到1965年。这期间，出版过十六分册的《试行本》，在向全国征求意见以后，按照《辞海》固有体例，合编为两卷本的《未定稿》。前后经过大约七、八年时间，一般说工作还是相当顺利的。这是由于很快地纠正了把大跃进的一套办法搬到《辞海》修订工

作中来的错误，从而初步摸索到辞书编写的规律，明确了《辞海》的性质和任务，及时地提出了“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即“前三性”）；在浦江饭店第二次集中修订时，又提出“正面性、知识性、稳定性”（即“后三性”），作为编写的指导方针。这样，参加各学科编写的同志，就有了遵循的准则和努力的方向。

同时，一开始就提出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生物学摩尔根和米丘林两个学派的处理，是当时大家所共知的事例。凡是两派共同承认的，就合为一条来写；不同的主张和意见，分列义项，各说各的。在学术问题上，允许争鸣，不强求一律。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

辞书不同于一般图书，更不同于报刊。基本的原则应当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准确而又简明地给读者以具体知识，释文恰如其分地如实反映出对象的实际，而且最好是用原始资料加以说明。要避免想当然和无根据的论断。介绍稳定性的知识，是辞书最根本的任务。这样也自然会得出依靠什么人编写或修订辞书的结论来。二十二年的实践证明，知识分子、学者、专家是主力。过去一直说火车的自动挂钩是詹天佑发明的，以讹传讹，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了。果真如此么？一位老一辈的科学家茅以昇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火车首先是在欧洲发明并广泛利用的，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时，中国还是很落后的，他不可能发明自动挂钩。我们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还到詹天佑的家乡访问过，看了他修京张铁路时的日记，没有发现与自动挂钩有关的任何材料。这样就改正了一个相传已久的重大错误，提高了（詹天佑）这一条目的科学性。

修订《辞海》是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必须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决不能掉以轻心，潦草从事。写一篇文章，作者可以任意发挥，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就行了。但是辞书的条目，字数有限，而又要给读者基本的和必要的知识，并且尽量做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言简意赅，不蔓不支，把释文限定在叙述具体内容范围以内，做到

具有严密的科学性。这对培养实事求是、认真严肃的优良学风，是大有帮助的。凡是参加《辞海》修订工作的同志们都有深切的体会。

这一阶段，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对社会学和心理学抓得过死，对某些条目采取躲闪回避态度，消极对待。最后以《未定稿》的名义出书，作内部发行处理，这应该说是为了怕犯错误而犯下的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天下又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对《辞海》偏偏求全责备，延误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当时即以“定稿本”向全国公开发行，任凭广大读者去检验，岂不更好？

文化大革命期间，算是第二阶段。《辞海·未定稿》被诬为集古今中外封、资、修大成的大毒草，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把一切罪名都加到它的头上，好象变成了人间罪恶的渊薮了。参加编写的人也无所容于天地之间，在劫难逃，不管在什么单位，几乎都被批斗。除原有的“罪行”之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再加上这样一个砝码，等于罪上加罪，罪加一等了。

1971年，周恩来同志提出把修订《辞海》的任务列入国家出版规划，并且希望能够及早出版。但是在“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把持操纵之下，横一个评法批儒运动，竖一个批判《水浒传》运动，《辞海》修订工作当然也被牵进了政治漩涡，于是大杀大砍，弄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了。他们以贴政治标签代替科学分析，把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人物按儒法两家的模式进行图解，大批判的语气充斥字里行间，《辞海》变成了十万大批判书，肆意破坏了辞书的规律性。更有甚者，“四人帮”及其爪牙，还妄图利用《辞海》为他们篡党夺权、树碑立传制造反革命舆论，美化吕后、武则天就是为叛徒江青“登极”鸣锣开道。

“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阴谋如果得逞，《辞海》必将是一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空话连篇，荒谬绝伦，棍子帽子满天飞，腾笑中外的大毒草。完全可以说，这场浩劫对整个文化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灾害，《辞海》更是难以幸免的。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全国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莫不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一样，《辞海》最后定稿出版，也有了指望，于是进入它的第三个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为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向生产建设方面来，号召九亿人民全力以赴地向“四化”进军。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这样也必然会突破前进道路上的许多禁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正是大家共同的要求，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去年十二月，上海市委决定恢复和充实“辞海编委会”，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对《辞海》进行最后一次修订，出版合订本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这一光荣任务下达后，经过九个月的艰苦奋战，《辞海》的编写、校对、发排等任务，提前完成了。我们没有辜负领导上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广大读者的要求，这是上海和全国学术界的丰硕成果，也是一切参加修订工作的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结晶。它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完成一部辞书的修订、编写任务，可以调动全国学术界的力量，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二十余年如一日，终于看到了它象一个满期的婴儿呱呱落地一样。纵然因为参加编写工作而受到“四人帮”的打击、摧残，但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再接再励，这种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敬佩呀！

二十二年来，《辞海》修订工作走了一个弯曲的“之”字形。它也充分反映了祖国和人民走过来的崎岖道路。但是不管怎样，真理在手，即可所向披靡，成为战无不胜的雄伟力量。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观点加以衡量，“四人帮”的祸害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螳臂挡车难道是可能的么？往者已矣，来者可谏，《辞海》的正式出版发行，是辞书出版事业的一个信号，预示着今后将有各种类型的辞书和工具书跟上来，为满足广大读者“求知欲”的需要，为推动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而不断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如果把二十二年修订《辞海》的经验汇集起来，那就应当表述为：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实事求是，为读者提供相对稳定性的知识；并以知识作为武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跻身于先进文明国家之林。

二、从修订《辞海》看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必然处于极端落后状态。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又经常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习以为常，积重难返。要想改变这种愚昧落后、固步自封的情况，必须依靠知识分子起先锋、桥梁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不厌其烦地再三告诫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没有知识分子，革命也不会成功。因而要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尊重他们。这些话都是针对中国实际提出来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通过知识分子才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工人阶级便不可能从“自在的阶级”走出来，并上升为“自为的阶级”。他们的斗争也只能限于为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的低级阶段，绝不能具有“去掉的只不过是脖颈上的一条锁链，而赢得的是全世界”这样远大、宏伟的理想。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明摆着的：就是团结、教育、改造。其目的又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在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长久以来，是受极左思潮干扰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林彪、“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排斥、仇视知识分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了极少数以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统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什么臭老九，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什么洋奴特务，什么草包骗子……。总之，都变成了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理应受到奚落、辱骂以至于惩罚。于是强迫他们去扫地，倒痰盂，刷马桶，当时就有人意味深长地感叹过：这才真叫“斯文扫地”呢！

林彪、“四人帮”专横的十几年，对知识分子采取粗暴的“专政”办法，这当然是一种极端反常的现象，不能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相提并论，加以混淆。

过去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走过弯路，但基调却是“左”的，不妨用“见外”两个字加以概括。他们竟然变成了国家的“客人”，缺乏当家作主的感觉。无端地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外，必然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力量真正用在刀口上。在有的领导看来，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而自己却以改造者自居。身分地位完全不同，又怎会产生共同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呢？长期以来，同床异梦，又怎能扭成一股绳，把工作搞好呢？

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是人民的一部分。特别经过二、三十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的考验，证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愿意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样也证明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的，并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鲜明的政治态度，难道还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么？要求人人都成为马列主义者，这不仅是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

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他们掌握和积累了某一方面的知识，或者学有专长。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首要的还在于团结，团结是教育、改造的前提；没有团结的愿望，就根本谈不到教育、改造的实效。况且教育、改造也不是单方面的，无论是谁都要教育、改造，因而它是双方的，需要取长补短，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团结、教育、改造是为了发挥知识分子更大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一切力量。学以致用和用其所长，大约便可加以概括。让电子计算机专家到商店里去打算盘，把一位航天学者分配去扫马路，这就是学非所用；学非所用，就是极大的浪费，愚人所不为，更何况是共产党呢？用其所长，就是工作对口，充分发挥他对某一学科的专长，落实下来，不要轻易改变。不然，乱点鸳鸯谱，学非所用，用

非所长，极大地浪费了人材，又怎能做到“各尽所能”呢？

在依靠什么人修订和编写《辞海》的问题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58年受大跃进的影响，曾经大搞群众路线。想当年，头脑一发热，几乎什么规律都不屑一顾了。全民作诗，李白、杜甫早已不在话下。把现成的铁窗铁门拆毁，以至于砸锅炼钢；掘地三尺，把生土翻上来，说是可以增产粮食。推而广之，“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大放卫星，亩产十万八万斤；“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吃饭不要钱，十年八年“进入共产主义”；全国城乡打麻雀……。单就《辞海》而言，大鼓干劲，大走群众路线，写出来的稿子却等于一堆废纸。

通过实践，对专家学者的作用有所认识，在浦江饭店三次集中时，明确了各学科主编的职责，条目释文也都由专家学者最后定稿。一直到《未定稿》付印之前，依靠什么人修订、编写《辞海》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但由于清规戒律很多，有的禁区甚至是万万碰不得的，因而等于带上脚镣跳舞，不能旋转自如。有时不可能从实际出发，戴帽子、贴标签、含糊其词、不敢画龙点睛的事情还不算少。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李秀成、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成了难题。因为彭德怀的原因，连〔平江起义〕也取消了。不是根据一个人的生平作出全面的估价，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是什么人说过那么一句两句，语焉不详，就据以“定案”，岂非冤哉枉也！？

另外，以我划线的情况也很严重。联合国是一个客观存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当时由于美、苏两霸纵横捭阖，操纵联合国作为争夺的工具，而所作决议又往往是不符合小国和弱国利益的。但从介绍知识的角度出发，联合国的主要组织机构，似乎应当多收几条。因为中国没有参加联合国，只收了〔联合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等有限几条。

对历史上的领土问题，也是顾虑重重，唯恐犯所谓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渤海国〕这一条目，就是明显的例证。凡是历史上的

问题,应当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如果躲躲闪闪,含含糊糊,前怕狼后怕虎,那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符合科学精神的。然而由于思想受到桎梏,谨小慎微,唯恐犯错误,就不能放手发挥专家学者的所长,尽量把应有的知识贡献给读者。

经过林彪、“四人帮”的大破坏之后,从去年12月起最后一次修订《辞海》,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进一步明确起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深入人心,大家解放思想,不断突破禁区,因而实事求是的精神得以贯彻,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进一步调动和发挥起来,对全面提高《辞海》的质量起了决定性作用。

知识分子就是要用知识为人民服务的,修订《辞海》,正是“得其所哉”。可以断言,没有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努力,《辞海》是不可能出版的。人造卫星上天,需要科学家的创造发明,否则不管多少人,即使是全中国的九亿人口,也不可能把它扔上天去。

1979年版《辞海》合订本在短短九个月里能够出版,固然由于过去已经奠定了一个相当坚实的基础;但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之所以如期完成,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不辞辛劳,全力以赴,也是其中主要的因素之一。从修订、编写《辞海》来看知识分子的作用,无论怎样高的估价也是不为过的。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是社会主义的工人,社会主义的农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在他们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利益。这些是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些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邓小平同志也在五届政协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里指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些科学分析,更加明确地规定了知识分子的性质和作用,大大有

利于调动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更加发挥革命积极性，为建设“四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一切力量。

知识分子正是用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为人民服务的，从修订、编写《辞海》的工作中，充分地证明了他们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也必须一心一意地依靠他们。只有这样，1979年版新《辞海》才能如期出版，向今年的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三、1979年版《辞海》的新面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至理名言。钝刀子割肉，只能少慢差费。《辞海》是一种工具书，供读者“质疑问难”，满足求知要求的。新版《辞海》尽可能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有助于探索知识，解决疑难。如果把它看成是“良师益友”，也未尝不可。

新版《辞海》的面貌究竟怎样，需要通过“比较”才能看得清楚。1936年出版的老《辞海》，和出版时间差不多的《辞源》和《辞通》是不相同的，各有偏重，各具特色，因而无从比较。新版《辞海》只能同老《辞海》和《辞海·未定稿》相比，从中看它的面貌究竟是怎样的？有哪些优点，还有哪些缺点？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把修订《辞海》任务交给上海呢？我认为，《辞海》有它自己的特点，不是其他辞书（如《辞源》、《辞通》等）比得上的。就体例而言，它是兼有单字、一般语词和百科条目的综合性辞书，很象小百科全书。单字归部首查检，以字带词，而词又是按字数和笔画多少排列的。就其性质而言，既然是综合性辞书，所收条目的知识面非常广泛，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都可利用。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不能什么都懂；不懂的要想弄懂，简便的办法就是求助于辞书或工具书。正由于人的知识面不可能太广，一方面的里手，可能就是其他方面的外行。为了取长补短，从无知变有知，也得经常查辞书或工具书。而《辞海》兼有单字、语词和百科的优点，使用的人必然更多。有个生字、难字不识么？查《辞海》；有

个语词不懂么？查《辞海》，有百科知识陌生么？也查查《辞海》。一般说，它是会满足读者要求的。在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下，《辞海》的用处是比较广泛的。

但是从1958年开始修订《辞海》，一直到1979年新版《辞海》问世，几乎等于重新编写。1936年版老《辞海》的影子仍然存在，但内容已经改观了。除单字和语词部分尚有较多保留而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条目和释文，改变极大，几乎“不识庐山真面目”了。几十年来中国和世界都有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科学文化也有极大的发展，老《辞海》早已不能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了，必须改革，必须更新，必须增补，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已经过时的、落后的甚至于内容反动的，也应当淘汰。在今天，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尽量做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这是我们同老《辞海》编写释文在政治原则方面的根本区别。

若与《辞海·未定稿》相比，条目有所增加，释义更加确切，新学科补充了，特别是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和干扰而不敢实事求是的问题，得到了纠正，澄清了是非，还原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对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毒素，本着“去毒务尽”的精神，仔细地进行清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戴帽穿靴，一切空泛不实的大批判语，也尽量地删除了。力争不出政治原则性错误和常识性笑话，一般可说做到了。对人物评价，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某些有争议的人物，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全面考查，慎重从事。原来《未定稿》的许多禁区，只要我们认识到的，也都突破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不能不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不能不归功于中央和市委的关怀和指导，不能不归功于全体编写同志和一切工作同志的协同努力。

总之，1979年新版《辞海》的面貌比过去新得多了，这主要的表现在：第一、条目增多、更新了。第二、释文更加确切稳定了。第三、整个内容充实了。第四、文风比较简洁明确了。第五、知识性得以全面贯彻了。在质量上比《未定稿》有较大的提高，更不要说